

# 北京商人的历史档案与移民人生<sup>①</sup>

董晓萍 蓝克利

**摘 要:**城市商业现代化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家族私人企业的位置和作用,为此需要关注城乡社会结构中的中小商号的特征。在北京老字号成文厚的个案中,其历史档案和移民史料之丰富出人意料,但内容也相当庞杂,尽管如此,它们仍能帮助我们思考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以往学者对山东向东北移民的劳动力问题关注较多,而对东北对山东的商业影响关注较少;对移民商人的海上路线关注较多,而对铁路沿线城市关注较少;对山东与东北和华北大区域的联系关注较多,而对连接两个大区域的北京、天津和大连三个具体城市的联系关注较少。现在关注这些被忽略的问题会发现,这类中小商号经历战争、社会事变和家族股份变更,实际上演绎了一种与稳定商业环境中颇为不同的商业口述史。这种研究会与研究者所习惯的思路发生冲突,这就要求研究者去考察中小商号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获得商业发展的例子,同时要求把商人与商业环境互动的各种线索重新加以梳理,按照中小商人自身的生活路线去思考,找出其中有价值的问题。它还提示我们,动态商业史是另一种历史的骨髓,特别是在具有传统与现代撕裂性的中小商号中尤其如此,所以要重视这方面的资料并加以利用。这种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给予这一研究过程和方法的提示。

**关键词:**动态商业史; 北京成文厚; 家族企业传统; 历史档案; 移民生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07&ZD037)

**作者简介:**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5);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清末民初至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留下了民族资本家的一份精神遗产,考察这份遗产,对思考中国现代经济崛起与社会发展有一定价值。其中那些中小商人的“民间经验”,包括他们的历史档案和移民人生故事,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引起学者的重视,实际上也应予以研究。本文拟以北京成文厚个案为例,对此加以讨论。

北京成文厚,专营纸张文具账簿,中国商业部命名为第一批“中华老字号”,现仍在开业,已有近80年的历史,距其私人家族企业史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是一个山东农村移民商号,原籍山东省招远县孟格庄村。家族六代经商,经理刘国樑是第五代。早在他之前,“成文厚”已经出名。从清末至民国时期(1821—1949),这个村庄的农民走出村庄,建立了声势很大的书铺业,在青岛、济南、即墨、烟台、蓬莱、潍坊、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牙克石、丹东、吉林、长春、沈阳、安徽、广州等16个省市,创建了“诚文信”和“诚文厚”的著名字号,对内又称“大书铺”和“二书铺”。北京成文厚是该家族

① 本项研究与中法合作项目“行业文化和专业知识传承”同步进行,已发表了系列文章,比较主要的有:董晓萍、蓝克利《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蓝克利、董晓萍《北京成文厚个案研究——撰写北京商业史的资料、方法与初步结果》,见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行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董晓萍、蓝克利《城市化与中小商人的“文化人”角色》,《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3期。本文首次从中国城乡社会流动与移民商人的人生故事的视角讨论这个题目。

企业的北京分号,创始人刘国樑,是二书铺的第三代商人,1909年在孟格庄出生,1925年到东北长春和吉林的成文厚学徒和任事,1935年到北京创业成功。在1940年代初,吸收现代会计知识,开拓了北京城市账簿业,将成文厚的发展带入鼎盛期,这是他的祖先所没有做到的。1949年后,刘国樑成为新政府管理下的成文厚公司首任经理,兼任同业公会副主席。1953年,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定性为“严重违法户”离开公职。我们将刘国樑的商业运作与政府商业管理政策做微观比较,分析文化传统和社会政策对商业企业发展的影响,并在这一个案的研究过程中,顺便讨论“民族资本家”的概念。

将北京成文厚与山东农村家族企业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农村家族企业虽然有全国网络,但仍以农村为中心,所有商人挣钱后都返乡定居;而北京成文厚是少数定居北京的家族商号。刘国樑以北京为中心,向全国(以北方为主)辐射,形成了“南有立信、北有成文厚”的鼎立局面,他是从农村走出,而在城市获得成功的“资本家”。

但是,北京城市档案和口述史对成文厚提供的信息极少。在档案中,仅有刘国樑原籍“山东招远”四字。在田野调查中,唯一掌握稍多信息的他的末科徒弟也只知道他的老家是“孟格庄”。他的子女大都在北京出生,对原籍毫不知情。唯长子刘基厚出生在山东老家,但7岁就被接到北京,以后有73年从未返乡。他们都已与山东农村的背景脱钩。可是,从本个案的整体研究看,北京成文厚的农村历史档案与移民生活口述史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它们能帮助研究者在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中小商号的运行过程及其价值观,而这对认识中国城市商业现代化的自身特征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的研究目标不是以经济为导向,而是研究中小商人的活动史和社会史。本文分三部分:一是介绍已搜集的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方法与原则;二是讨论成文厚的农村家族积累,北京成文厚商业组织在传统家族行业中的位置,延续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初其发展商业企业的努力与冲突,具体分析该个案的价值;三是阐释城乡社会结构中的中小商号经营模式与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指出城市商业现代化中家族私人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一、资料和处理资料的方法与原则

首先重点谈谈我们搜集和处理城市工商企业个案资料的方法和原则。

2006年至今,我们在北京和山东做了商业企业个案史的调查,搜集了地方文献、历史档案和口头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是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合作,得到了北京成文厚公司领导的支持,也获得了成文厚农村家族企业后代的帮助。现已搜集的主要资料有:1. 西城区政府档案2种;2. 刘国樑编制的1940年至1950年设计生产的账簿表单样本1册,共包括账表汇单1132种;3. 成文厚档案19种,并已制成《成文厚老账簿电子书》和数据库;4. 成文厚企业地方文化志1种(电子本);5. 成文厚口述史访谈32人。

从搜集资料的过程看,北京清末民初的商业史料相当缺乏。城市档案和企业档案有不少局限,对老一代当事人的访谈也几乎濒临中断。但即使如此,对这两种档案的利用仍然是必需的,对当事人的访谈也仍然是必要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成文厚,自2007年7月起,我们走上了出京踏访的长途旅程。至2011年7月,历时4年,我们共去了5个档案馆,包括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档案馆、长春的吉林省档案馆和长春市档案馆、吉林市的吉林市档案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共查阅历史档案185种,其中与成文厚直接相关的信息36条,涉及成文厚和诚文信于19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在哈尔滨、长春和吉林商号经商者8人。我们共赴山东招远孟格庄村调查3次,见到了当年在东北哈尔滨和山东省内的成文厚和

诚文信做学徒的多位村中老人,并进行了座谈。我们还拜访了“二书铺”刘作信家族的后代,也与“大书铺”的子孙进行了交谈。此外,在2009年二进孟格庄时,刘国樑的长子刘基厚夫妇和次子刘兴厚与我们同行,对我们认识这个家族的历史档案和移民生活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在处理上述资料中强调两点:一是承认城市档案和企业档案有局限性,中小商户资料的不完整和个人回忆信息也有不确定性,但这大概正是个案分析的一般特点;它们带有社会现象与各种资料之间的紧张感,能引起学术思想范畴内的不舒服,但也会因此而促动学者去关注特殊社会史;二是从使用搜集资料和撰写城市商业史的目标出发,思考研究城市商业组织和商业文化的可能性,以及在具备诸种可能性之后,要考虑怎样利用农村家族的历史档案和口述史,重新组织和解释这类史料,考察行业知识的传承史,成文厚的个案因此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一般认为,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巨大的社会动荡下,城市商业发展很难发展,但成文厚的个案却提供了另外的事实,它证明中小商人在大动荡中,也可以发展自己的社会角色。它们中间的很多人是农村在地精英,进城之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外省知识,具有发展商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提升市场化的能力。他们中的少数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商人还能取得明显的创业成就。这种现象是仅仅从宏观经济史和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所看不到的。

## 二、北京成文厚商人的农村家族积累及其在传统家族行业中的位置

我们要讨论北京成文厚经理刘国樑这位农村移民商人,后来怎样成为北京现代商业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在北京现代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具有城乡二重身份的中小商人怎样带来了城市活力?

刘国樑出身一个世代务商家族。从清末的第二代起,家族内已有两个商号,一个叫“大书铺”,字号“诚文信(或写作“承文信”、“成信”);一个叫“二书铺”,字号“诚文厚(后写作“成文厚”)”。它们同属于孟格庄村刘姓家族两个不同的房支。其中,大书铺发家较早,在1920年代初已发展到极盛,商人回乡置办房产的气派,绝不亚于徽商和晋商。1920年代中期以后,二书铺后来居上,二书铺的祖先刘作信善治纸张,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代印书籍,改革经营品种,迅速提高了商号的知名度,带动了家族商业的整体繁荣。

刘国樑是刘作信的直系孙辈,经营北京成文厚21年。他在传统家族行业史上的特殊位置有三。第一,他16岁离开家乡山东,到东北长春和吉林的成文厚商号学徒和做事,后经大连,来到北京,在成文厚家族企业史上,他是连接山东、东北和京津两地的人物,而这种身份在刘姓家族老一代农村商人中具有共性。第二,成文厚有三个货源基地,分别在安东、大连和天津,这些都是日俄在东北和京津一带控制铁路沿线和口岸城市的地点。我们在追踪刘国樑的经历时,注意到这些货源地点。他是家族中跑过大连和天津的人,富有供销历练,而掌握货源以保证质量是成文厚商业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他在经营成文厚以后,始终重视纸张货源问题,与他这种经历有关。第三,在祖父刘作信之后的三代人中,刘国樑是唯一再度改革家族商业方向的人。他在书多账簿少的北京市场,审时度势,利用自己在山东农村和东北城市积累的记账知识,抓住与北京知识分子、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毕业的会计贾得泉合作的机会,将家族擅长的纸张加工印刷业改为会计账簿业。他的这种选择适应北京社会的实际,为他开辟新市场带来了商机,加上他后来的技术发明、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忠诚勤奋的人格品质,终使他一举成名。

北京成文厚的历史档案和移民史料的丰富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但内容也相当庞杂,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这些分散的资料中,多少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例如,以往学者对山东向东北移民的劳动力问题关注较多,而对东北对山东的商业影响关注较少;对移民商人的海上路线关注较多,而对铁

路沿线城市关注较少;对山东与东北和华北大区域的联系关注较多,而对连接两个大区域的北京、天津和大连三个具体城市的联系关注较少。刘国樑学徒和经商的年代,经历战争、家族变故和社会事变,几度改换商号地点和行程路线,实际上演绎了一种与稳定商业环境中颇为不同的商业史叙事。对他和他的商号的研究,会与我们习惯的一些思路发生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去考察这种商人和商号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获得商业发展的例子,同时要求把商人与商业环境互动的各种线索重新加以梳理,找出其中有价值的问题。这种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给予我们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的提示。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北京成文厚的家族积累。

#### (一) 东北铁路和京津航线在成文厚史中的作用

从历史档案和口述史看,在东北的中长铁路沿线和渤海口岸发达的城市,自1921年起,在牡丹江、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和大连等地,都有成文厚的商号。<sup>①</sup>刘国樑的前辈在东北选址经商,除了山东移民潮的关系,也与当时的中长铁路和渤海运输线有关,铁路和口岸给东北的中、俄、日经济带来了全线繁荣,也给中小商号在东北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利益。<sup>②</sup>

中长铁路南端的对接港口城市是“大连”和“天津”,在刘国樑达到东北之前,在民国初期,俄国势力占上风,离俄国最近的港市是天津,天津就有大书铺“诚文信”的商号,也有刘国樑的家族亲属开设的小商号。

综合历史档案与口述史资料,可以了解农村成文厚的具体信息,下面是哈尔滨历史档案中的信息,见表1。

表1 1931—1943年哈尔滨特别市道外商会《哈尔滨特别市道外商工名录》原件抄录

商号	资本	营业所	批零	经理	店员数
成文厚	14 000	南头道街70号	批零	王恩田	78
承文信	3 200	正阳四道街4号	批零	宋鉴明	10
承文信	3 200	南勋街32号	批零	宋鉴明	15
成文厚支店	1 600	正阳11道街3号	批零	王金铭	5

表1是当时日本人搜集整理的哈尔滨商号历史档案。在表1的第一列“商号”中,在第一行和第四行,有“成文厚”和“成文厚支店”;在第二、三行有“承文信”(即“诚文信”)。这是大书铺和二书铺赴哈尔滨的商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信息,其中记载的三位经理,王恩田、宋鉴明和王金铭,经我们到山东招远孟格庄调查,除了“王恩田”外,对另外两位,老人还都能回忆,这对我们核对历史档案是难得的旁证。另一方面,历史档案与现代档案一样,在记载商人信息方面是片断的,它们不会记载商人的日常生活,也不记载商人的家族企业联系,在这方面,商人家族的口述史又成为不可替代的补充。村中老人向我们描述了宋鉴明在哈尔滨的一些业务活动,甚至他的精神面貌和穿着西装革履走路的态度。经老人的解释,我们还知道,原来宋鉴明正是刘作信的长孙刘秉汉(函)之妻的兄长,在刘秉汉1942年携全家回山东后,便将哈尔滨承文信的店铺交给他料理,于是他自报“经理”。下面是长春和吉林历史档案中的成文厚信息,见表2。

① 参见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道外区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3、295页。在《道外区志》第293页,记载道外区头道街(原南大街),有“书铺2户”;在第295页,记载道外区承德街有“书籍3户”。

② 参见黑龙江省商业厅《黑龙江商业通览》上,哈尔滨: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第43—46页,重点参见第46页。

表2 1921—1939年长春、吉林成文厚的档案原件抄录

编者	题目	时间	成文厚历史信息
吉林商工会	吉林商工公会 会员名簿	康德五年 (1938)	成文厚“氏名”徐瑞芝,38岁。书籍业、河南街242号。1936年《北平旅行指南》:“西单大街成文厚书店”:“徐瑞芝,古今书籍刊物杂志,学校用品,自来水笔,西单商场对门。”
长春商工名录 编纂所	长春商工名录	大正十年 (1921)	成文厚“氏名”“刘化南”,北大街。 刘国樑 1925—1930年在长春市
长春商工名录 编纂所	长春商工名录 (《华商》)	大正十一年	成文厚“刘华南”, <sup>①</sup> 北大街。 刘国樑 1925—1930年在长春市
宝熙署	新京市商会会员 汇编	康德元年	成文厚“经理人”刘式堂,柜伙17人 书籍文具业,北大街27号 刘国樑 1931—1935年在吉林市
日吉林商工公会 松冈繁	吉林商工名录	昭和十四年 康德六年	成文厚“代表人”徐瑞芝。书籍、文具、纸类,河南街
日新京商工会议 所	新京商工名录	昭和九年 (1934)	成文厚“经理”侯鑫三,“财东”刘式堂 北大街27号 刘国樑 1931—1935年在吉林市

表2是日本人在长春和吉林搜集整理的历史档案原件抄录,我们找到的档案时段自1921年至1939年。在这份资料中,第1行和第5行都有“徐瑞芝”的名字,他就是被《北平旅行指南》所记载的书商。由历史档案可知,1936年他在北京,1938年和1939年他在吉林。由刘国樑末科徒弟樑吉照的口述史可知,1940年代末,他又在北京跟刘国樑一起开店。1952年,他在西单大街的商号被刘国樑购买。再看第2、3、4、6行,它们所记载的历史信息正是刘国樑在东北习商时的农村家族背景。我们将这4条历史信息按时间顺序排列,与刘国樑1952年在北京成文厚工商档案中填写本人的个人简历对照,再参考刘国樑的农村家乡的口述史,可梳理出刘国樑与农村家族的东北商号的相关信息如下。

1938年,哈尔滨成文厚的经理是十七爷刘从先,与他搭伙的是“徐瑞芝”;诚文信(承文信)的经理是刘作信的长子刘秉汉,接替刘秉汉的是宋鉴明。在这期间,刘国樑于1925年至1930年在长春成文厚学徒,经理是“刘化南”;1931—1935年在吉林成文厚学徒和任事,财东是“刘式堂”,经理是侯兆祥的父亲“侯鑫三”。这期间东北各成文厚和诚文信分号的货源由十八爷刘进先掌管,1934—1940年,十八爷任安东(现“丹东”)成文厚和诚文信的经理,并负责给哈尔滨、吉林和长春发货。关于十八爷的历史档案,可以从北京档案馆查到,这段履历是他本人填写的。刘国樑于1935年到北京开成文厚分号,于1938年和1942年先后接妻儿和父亲到京。

关于刘国樑个人的家庭经历,也可以通过上面提到的他在工商档案中所填写的个人履历和他的后代的回忆资料掌握线索,他于1925年离开山东赴东北长春学徒,在这次出徒后和转往吉林成文厚的间隙时间里,20岁左右的他回乡结婚。他的长子刘基厚1931年在孟格庄出生,1938年到北京。

在哈尔滨、长春和大连等刘国樑住过的城市,西式和日式建筑很多,到了东北就好像到了外国一样,连我们这次到东北还有这种感觉。这难免让我们猜想刘国樑当时在此从商十年的感受。这里大概是当时商人寄托浪漫的成功想象的乐园,至少足以打开农村移民的眼界,而东北这种氛围本身就应

① 表2使用了长春商工名录编纂所于1921年和1922年编制的两份日文商号登记档案,即1921年的《长春商工名录》和1922年的《长春商工名录(华商)》,内有两条有关成文厚商号的原件抄录信息,略有差异的是成文厚经理人的姓名分别为“刘化南”和“刘华南”,两人是否为一?我们曾就此在进行过商人家族口述史访谈和商号原址田野调查,但没有发现任何新线索;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本文对这个两个姓名仍按档案原文录入,不做任何改动。

该是培养一个年轻商人的必要条件。

## (二) 东北会计史

刘国樑在北京使用的“簿记”一词,在1912年吉林市甲种商业学校开设的同名课程中已经使用,<sup>①</sup>哈尔滨也有俄国人开设的簿记学校,这些都比刘国樑在北京接触的基督教青年会所开设的商业学校“簿记科”要早五六年。<sup>②</sup>关于刘国樑印制北京借贷账簿表单,我们查到吉林省商业志的记载,自1931年以后,日伪政权强迫各商号使用借贷法记账,这时刘国樑正在长春和吉林市的成文厚任事,现在已无法知道是否他此时已了解借贷法,我们只能从他生活在这两座日军控制的城市中,不大可能摆脱这种会计制度,推断他不一定完全不知道。他到北京后,与北京会计贾得泉合作,将借贷式新式账簿投入开发,又任用从吉林成文厚来的王文友担任账簿设计工作,这至少能说明,他看好这个商机的想法,已逐步成熟。

## (三) 商业组织与宗教组织

我们在东北档案中还查到,山东移民组织和宗教组织发达,在哈尔滨成文厚的同一条街上,就有“道外商会”、“基督教会浸信会”和“山东会馆”三种组织。前面提到,刘国樑在北京也加入了同业公会和缸瓦市基督教会。我们看不到他的组织性与哈尔滨前辈模式的联系,但客观地说,两者之间有影子效应。

# 三、北京成文厚商业组织的家族模式

从历史档案和山东农村调查资料看,成文厚商号组织有一套家族模式,主要有三种。

## (一) 著名字号联袂合作

山东农村的“书铺”业非自成文厚始,它原服务于科考试卷用纸和笔墨文具业。成文厚之成名,前面提到,与刘国樑的祖父刘作信将成文厚与中华书局联合经营有关。我们从1938年和1939年的一份长春档案中又查到,刘作信的后代在长春经商时,仍与中华书局联袂,合办成文厚,<sup>③</sup>可见其重视名号的家风,见表3。

表3 1938年吉林档案原件抄录

编者	题目	时间	成文厚信息
吉林商工会	吉林商工公会会员名簿	康德五年	成文厚,“氏名”徐瑞芝,38岁。书籍业,河南街242号。1936年《北平旅行指南》:“西单大街成文厚书店”。“徐瑞芝,古今书籍刊物杂志,学校用品,自来水笔,西单商场对门。”

表3是上面已经引用的1938年吉林档案原件抄录,表中“成文厚信息”一列中的“徐瑞芝”,前面已经两次提到他。他是中华书局的人,就在成文厚里开书店。成文厚从晚清刘作信开始与中华书局合作,通过书商徐瑞芝的历史档案,可以把这条合作的脉络延续到1952年,这又再次提醒我们历史档案之珍贵。

## (二) 城乡流动的家族就业链

成文厚不在农村家乡经商,它们在招远县城和孟格庄都没有任何一个店铺。家族企业全部在城镇经商。但是,其就业链是在家族人员的城乡流动中完成的。

① 参见黑龙江省商业厅:《黑龙江商业通览》上,第52页。

② 参见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财政商业学校招生》,《益世报》1917年1月28日第1版。

③ 参见吉林省档案馆藏,C3198—P147、149、151,吉林商工公会、松冈繁《吉林商工名录》昭和十四年,康德六年,成文厚“代表人”徐瑞芝。

从实地调查看,山东老家的刘姓家族男孩长到12岁以后,由亲人或熟人带到北方大城市,在两个书铺的城市分号中学徒,成年后再回乡娶亲,这时的姻亲关系可以作为血缘关系的补充,从商号的人力资源上,提供学徒或雇工的备选人员。刘国樑也不例外,他在长春学徒期满后,回乡娶亲,以后其妻和妻弟再随他进城经商。我们在孟格庄的另一访谈对象刘瑞瑜老人,1938年到哈尔滨的二书铺成文厚学徒,其亲属渠道是堂亲刘恩彦,时在哈尔滨的大书铺帮工。刘恩彦又做保,介绍他的堂兄刘瑞国进了二书铺的成文厚。对成文厚商人回乡娶亲的婚姻观,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到其观念有二:一是认为回乡婚娶是孝顺父母,二是对城市女子有戒心。

### (三) 师徒制度

农村成文厚的师徒制度分三层。

第一层是私塾,在农村完成。一般男孩到六七岁左右就被送进村中私塾,学两种本事:珠算和写字。被调查人员无论当不当会计,人人都学过算盘。村民对打算盘所带来的务商能力和向上层社会浮动的价值观是普遍认同的。这种技能观在村民几代人中间传承,已形成历史,至今农民还把掌握珠算技能看成是一种很高的身价,认为打算盘就是做人。

第二层是流动层,即家长送男孩离开农村、进城学徒。聪明好学的少年,能适应城市商业生活,便留在城市,随长辈打理商号生意,其余成年后或中年时返乡务农。返乡者也因为在大城市见过世面,回村后当会计或村干部,成为农村人才。

第三层是精英层,他们熟悉传统家族业务,能在城市复杂的商业环境开辟市场,彻底城市化,脱离农村。刘国樑是经过第一层和第二层,到达第三层的成功者。

刘国樑也照此模式培养自己的长子刘基厚。刘基厚1931年出生于孟格庄村,由于他是二书铺曾祖刘作信身后十五爷刘显卿的长子长孙,一经出生,便被定为该房支的继承人。他少年时代迁居北京,在北京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49年前后,北京成文厚到达顶峰期,刘国樑曾同时担负起了教育这位长子的三项任务:学习商业企业管理、商业会计和英语。他把继承家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缄口深思的长子身上,下功夫进行全面培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来的社会变迁,刘基厚的接班也许不是梦。虽然他终未从商,而最后成为北京某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领导,但他始终是北京成文厚的“厚”字辈中家族地位最高的人。

刘基厚这位来自山东农村的、以小长袍、小官帽的“少爷装”进城的商户少年,后来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他在家族企业受到“三反五反”的深重打击后,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影响,下决心按照苏联电影中集体农庄的榜样,投身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理想之中。他大学毕业后,两度选择去河北和甘肃的农村工作。他在一个比山东老家还要贫穷数倍的甘肃农村,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当上了该地区的科委中心化验室业务负责人。他也是一位多面手,能从事农学研究,也会缝衣服、补袜子、打家具,还能打一手好算盘和写一手好字。他以一人之力奋斗拼搏取得的成绩,与他的祖父辈从农村到城市创业的精神遗产相比,并不逊色。他与父亲刘国樑两代人的城乡生活模式,彼此相反相成,而这正是北京商业史与社会史分分合合的复杂性。

## 小 结

最后,我们重点从利用历史档案与商人的入生活动口述史的过程和方法方面,总结本项研究的要点。

第一,把历史放在地图上,寻找动态的社会史。对历史档案开展实地调查,是把历史放到地图上,按照当事人自身的生活路线去思考。由于北京社会历史的巨大变迁,具有城乡二元背景的商人口述史大都孱杂着痛苦的人生情感和悲情的价值理念,不容易被文献化,所以,口述史对解读历史档案往

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口述史是另一种历史的骨髓,特别对具有传统与现代的撕裂性和商业技术私密性的中小商号来说十分重要,所以需要搜集和利用。

第二,口述史是当事人的“正史”。对恢复城市中小商号的社会史来说,口述史也是一种“正史”。在当事人看来,口述史才是最可靠和最保密的历史。在没有遇到他们看来可靠的人之前,他们是决不肯开口的。然而,口述史能够提供中小商人的理念、传统家族关系、社会网络,以及他们在残酷竞争和生死挣扎中取得的市场业绩和社会认同,这些信息都是城市档案、历史档案和相关地方文献所不具备的。当然,商人及其家族成员在口述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会将从商的人生经历加以故事化和传奇化,但对此我们也有新的认识。我们现在认识到,其实这也正是一种具体商业史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小商号自我教育的过程。

第三,使用农村家谱的几种办法。近年使用农村家谱开展研究的成果很多,但对如何使用家谱资料的方法讨论不够。我们通过个案研究感到,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字与名的差别。家谱是以家族字辈谱为结构核心的民间书写文献,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它所书录的家族成员姓名,在被复述和传承时,会有字与名的差别。如“刘秉栋”是字,“刘国樑”是名,家谱用字不用名。比如,我们最早从刘姓家族的三婶那里拿到刘国樑的家谱,但问她刘国樑是谁,她说不知道,因为家谱上写的是“刘秉栋”。2. 读法与写法的差别。家谱是年度仪礼兼日常叙事的民间口头文献,被写进家谱的人名,与实际使用的人名,在写法上和说法上,也会经常产生变化。如刘作信的家谱上写长孙“刘秉函”,被其曾孙刘光厚念作和写作“刘秉汉”。3. 方言与户口的差别。山东农民进城务商后,在将个人姓名的方言读法登记为北京城居地户口簿时,也会有差异,如十七爷“刘从先”,在户口本上登为“刘重先”,连大学毕业的刘基厚也会写作“刘重先”。再如十八爷“刘进先”,在档案中登为“刘进贤”。<sup>①</sup> 4. 家族与商号身份的差别。中小商号在登记档案姓名时,会利用更动人名的微妙变动,解决家族传统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差异。在刘国樑的北京档案中,家族成员的姓名登记,分四类,即登记人名、户主人名、家族股份人名和企业经理人名。这样我们在他的档案中看到的填写分工是“登记人名”为“先”字辈的“刘显卿”,即刘国樑之父,“户主人名”为“刘李绍棠”,也是“先”字辈的家族长辈,即刘国樑之母,“家族股份人名”为“先”、“秉”和“厚”三代字辈谱中的股份所有者,“企业经理人名”为“刘国樑”自己。这种人名变动的填写,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不少困难,但这是家谱更靠近家族传统管理文化所致,而不是档案的欠缺。中小商号在不违反家族传统的前提下,采用这种登录方法,进入了城市社会管理网络。5. 当事人创造历史细节。刘光厚与刘国樑是叔侄关系,在刘国樑生命弥留之际,他保护了刘国樑,但他在自己保存的家谱上,却一直没写刘国樑的名字。直到最近,他才把刘国樑的名字加上,不过只写了刘国樑的字“秉栋”,他要确保此举对他本人和刘国樑家族都没有任何风险。

我们的城市社会史研究最终要呈现什么呢?就是要呈现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北京成文厚的历史档案与商人的移民人生所告诉我们的种种民间经验,与布迪厄所提到的社会资本与“区别认同性”(distinction)所导致的一种社会网络的具体组织形态,<sup>②</sup>多少有吻合之处。

(责任编辑:王丰年)

① 《益兴金笔行分行、益兴金笔商行》档案,北京档案馆,档号:022—007—00295,档案时间:1955年。

② 参见 Pierre Bourdieu,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 i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Année 1980, Volume 31, pp. 2—3。布迪厄在此文中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另一个相关概念“区别认同性”,参见 Pierre Bourdieu,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 p. 3。我们认为,应将这两个概念共同考察,才能体现他的整体观点,开展比较研究。



eliminate social figures with mobilization ability was a top priority for the regim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ociety and outrageous social system as well as corrupted officials, instead of choosing an easy and ineffective way to crack down on whom exposed and exploited those abuses to struggle for their own benefits.

###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Migrant Life Stories of Beijing Chengwenhou

Dong Xiaoping, Christian Lamouroux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commerce has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tatus and the role of the private firms created by rural familie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 special pattern of the medium and small businesses structurally linked to both countryside and city.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old-firm* Chengwenhou is documented by several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rich materials related to migrants. In spite of a jumble of data, some new aspects can be approached: scholars have already devoted many studies to the transfer of manpower from the Shandong province to the North-East region, but very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impact of the North-East on the Shandong province in terms of commerce; there are many analyses on the sea route followed by the merchants migrating from the Shandong, but almost no study on the role of the cities along the railway;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two regions of the North-East and the Huabei are quite well studied, but not the concre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ree big citie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Dalian which connected the two regions together. By focusing on these new questions, we can uncover how these medium and small firms could survive the war and social turmoil, and why they made transfer of company shares within the family. In brief, this kind of study can lead us to depict their business experience in rather different terms than the other firms which developed their activities in a more stable environment, and to express some conclusions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ose drawn by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raise new valuable questions and reach new conclusions, we should investigate various cases of medium and small firms developing their activities in a risky environment, and then we need to reexamin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usinessmen and this uncertain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sonal and concrete life of the manager. This is a crucial aspect of the dynamics of business history. Hence,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to materials related to this dynamic history of the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the ruptur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order to uncover the intimacy of the decisions regarding commercial knowledge and know-how. The present article is devoted to the familial business tradition of Beijing Chengwenhou and the role this tradition played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societies.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present study only make sense by the approach and the methods used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 Ideal and Dilemma of University Reform—During Luo Jialun in Charge of Tsinghua University(1928–1930)

Liu Jiqing

Luo Jialun is a president of university who could be rated as an educator in modern China. In August 1928, he was appointed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resigned in May 1930.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he carried out drastic reform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implemented various reform measures,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However, there were very strong tensions between the Tsinghua President Luo Jialun, who had a revolutionary attitude and the university at the beginning. The tension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respects: firstl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tate regulated education that he represented and university autonomy; secondly, his ideal of university and management ideas contradict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thirdly, Luo Jialun's personality was in conflict with Tsinghua traditions. The tension gradually exposed in the reform by Luo Jialun, leading to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school. Universit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as the regularity of itself. It's not effective to rely on the revolutionary to reform university. Essent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is in a 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s indic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the reform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reform and governance, there are speci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s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 idea and path and problem handling of the reform as well as the effect of the reformers personality and other factors on success and failure, gain and loss of the university reform regarding Luo Jialun as a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singhua reform movement in the 20th, 30th of the last century as the background,

### Joseph Needham Puzzle in the Viewpoint of Self-negation (kan-xian)

Yang Zebo

Self-negation (kan-xian) is an important idea of MOU tsung-san who is a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 in second generation of modern Neo-Confucianism. Though the idea is not directly from Joseph Needham puzzle, they still have some theoretical rel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article reviews Joseph Needham puzzle in the Viewpoint of Self-negation (kan-xian), and reveals the puzzle is really an ambiguous one. The reason why the situation came out is that Joseph Needham had not enough understanding to Chinese